

毛共對學生的迫害

汪學文

一 毛首迫害學生的基本原因

毛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從政治觀點來說，其打擊對象主要的就是反毛的「當權派」，而從文化角度來看，其鬥爭的矛頭却始終指向知識份子，以知識份子為敵，從學校鬥到社會，從黨內鬥到黨外，從老知識份子鬥到新知識份子，從教師鬥到學生。那些青年學生在「文革」初期雖然紛紛組織紅衛兵，作為毛澤東鬥爭「當權派」的工具，但是曾幾何時，他們同樣沒有逃脫被整肅、下放，以及其他種種迫害的命運。

毛澤東如此瘋狂地迫害和排斥知識份子，甚至企圖消滅知識份子，乃是基于階級的成見和荒謬的理論；他認為知識份子以出身小資產家庭為最多，大都具有容易動搖的性格，思想不可靠。為了克服這種性格上的缺點，因而主張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要「長期地、老老實實地拜工農兵為師，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換句話說，就是要知識份子在工廠和農村的強度勞動生活中，去磨盡個人的志氣，受盡工農的歧視與壓迫，以樹立「永遠跟着共產黨走」的思想。同時，毛澤東認為書不能讀得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也不能讀得太多，讀得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或修正主義者。因此，他的教育方針主張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培養知識份子；學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而不准有個人志趣，升學意念，和成名思想。這就是說，毛澤東一方面要原有的知識份子下鄉下廠，接受工農份子的再教育，使他們在農人的隊伍裏做農人知識份子，在工人的隊伍裏做工人知識份子；另一方面則要把

青年學生訓練成為略有文化的工人和略有文化的農人。這兩種措施顯然祇有一種目的，那就是將知識份子消失于工農階層之中，使其根本不再存在，以降低反毛反共活動的可能性。這是消滅知識份子的毒辣政策，也是全面性的愚民政策；這是毛澤東要毀滅傳統文化的根本原因，也是毛澤東要迫害青年學生的基本原因。

毛澤東對於知識份子，以往是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對於青年學生，本來也不想「一棍子打死」，而希望培養成為「有文化的勞動者」，訓練成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在毛共控制下的大陸青年，因目睹社會的劇變、現實的殘酷、家庭的悲劇，以及身受升學就業之艱難、勞動生活之困苦，大都感到希望幻滅，精神喪失憑藉，不知何所適從，以致其思想與毛澤東政策之間，無形地保持着相當的距離，自然地存在着若干的矛盾，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矛盾，業務觀點與政治觀點的矛盾，以及自由思想與極權思想的矛盾。而這些矛盾，隨着時間的發展，愈來愈深刻、愈尖銳。換句話說，大陸青年學生始終普遍地以個人主義、業務觀點、自由思想，去對抗毛共的集體主義、政治觀點、和極權思想。及「文革」開始，大陸青年學生乃藉着「紅衛兵運動」，「打着紅旗反紅旗」，反對一切，打倒一切；並且以「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對待一切，否定一切，以發洩其不滿情緒。這些思想和行動，當然是以反對毛共統治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標，因而為毛共增加了無限的困擾與煩惱。同時更使毛澤東非常失望，因而在所謂「十八點最新指示」中曾經很感嘆地說：「本來想在知識份子中培養一批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份子，包括仍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識份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因為解放十

七年來，文化教育修正主義份子把持着，所以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血脈之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識份子必須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關鍵的階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觀，否則，就走向革命的反面。」（註一）這段話充分地顯示出毛澤東對於知識份子、對於青年學生，不但大感失望，而且已恨之入骨。

毛澤東這段話說了沒有多久，就推行「整頓紅衛兵」、「下放學生」，以及「知識份子再教育」等一連串的迫害政策。

由上可知，毛澤東的荒謬理論和主張，導致了他迫害青年學生的罪行，而大陸青年學生反毛反共的思想和行動，倒過來又促使毛澤東加強其迫害青年學生的決心和措施。如此互為影響，於是矛盾越來越尖銳，鬥爭也越來越激烈，以致使得毛澤東既無法完成其「戰略部署」，又難以推展其「教育革命」。

二 毛共對學生的勞動改造

毛共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前者的目的在使青年學生「革命化」，後者在使青年學生「勞動化」。根據毛共的教條，「革命化首先要勞動化」，因此，青年學生不僅要在學校裏半工半讀，接受勞動教育，而且還要下放勞改，有的到農村插隊落戶，有的到匪軍農場勞動鍛煉，有的則到工廠做工，其中以下放工廠者最少，下放農村者最多。在「文革」以前，毛共下放青年學生至農村落戶，計達四千萬人；「文革」以來，毛共下放農村的青年學生，估計約有一千萬，下放農村的社會青年，亦有一千萬，共計又達兩千萬人。據去（五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指出：「在毛共的強制措施下，並不征求學生本人同意，由學校當局開出了下鄉學生的名單，名單開出後，也不管學生的健康狀況和家庭情況如何，就宣佈動身時間，集合地點。在槍桿的威脅下，青年男女必須按時到達，列隊出發」；報導中又說：「毛林集團利用這種辦法，已經把三千萬名城市男女青年，下放到農村勞役。」這個三千萬的數字，是否可靠，尚待考證，但是，就毛共近年掀起的下放高潮看來，要達到這個數字是可能的。

毛共對學生的迫害

大陸青年學生，其接受「勞動改造」的場所，雖然並不相同，有的在廠，有的上山下鄉，但其所受的苦難，却鮮有出入：

（一）下放農村插隊落戶

當「紅衛兵運動」達到高潮時，毛共因有欲罷不能之慮，乃立即將這些造反的青年學生自各個串連地區召回學校，稍加整訓後，就展開下放工作。據共匪新華社五十六年十月十日報導稱：北平一些中學的「革命小將」，已於十月九日前往「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白音寶力格公社」，充當「普通的社員」、「普通的牧民」。「這些革命小將，是北京二十五中、二十二中、女八中、女十二中的高中和初中的學生。他們有的是學校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有的是革命羣眾組織的負責人，有的是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積極份子，他們都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鍛煉出來的革命闖將。」這些「北京的紅衛兵」做了「草原上的新牧民」以後，據說「生活不習慣，語言不通，有許多事情不懂，一切都得從頭學起」。這些「羊倌」們，白天要徒步出去放羊，而且翻山越嶺，不管多冷、多累、多餓、多渴，他們都不敢叫苦，羊走不動了，還要一隻隻地把它背回來。晚上，到「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展開活動時，不管夜間多黑、路途多遠，他們不喝茶、不吃飯也要先跑去學習。（註二）

在黑龍江，截至五十七年六月，全省已有兩萬名城鎮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去落戶。這些上山下鄉的青年，成份和北平的大致相同，「有的曾經是市、縣中學紅代會的負責人，有的曾經是學校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還有許多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註三）足見紅衛兵的下場，基本上是一樣的。

上海市去（五十八）年一年就有五十萬名知識青年下放農村落戶。據說，「現在，在黑龍江畔，長白山下，井崗山上，內蒙古草原，淮北平原和雲南、貴州等地的深山密林裏，到處都有上海革命知識青年的足跡。」（註四）青年學生下放之多、分佈之廣，由此可知。

這些青年學生下放農村後，既要受匪幹的迫害，又要受老農的歧視，而每月勞動所得，尚不足以維持溫飽，生活實不如牛馬。例如一個湖南下放女青年的日記，就充滿了無限的辛酸，她在日記中說：

「今天，場裏發工資，這是我第一次領工資，第一次通過自己辛勤的勞

動換來的勞動代價呵！我勞動力中等，領了六·五元（僞人民幣），扣除伙食費六元，還餘下五角錢，我想發幾封信，想買一塊肥皂，又想買一支牙膏。是先買肥皂還是買牙膏呢？……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考驗』吧！」

「勞動，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人家都是這麼說，我們是沒有家的，是在街上打流的，下到農村來勞改。」（註五）

這些都是用血和淚寫成的控訴，但是被毛共看到，又成爲「反革命」的罪證。

（二）下放匪軍勞動鍛煉

大陸青年學生下放匪軍，實際上同下放農村差不多，因爲他們不是到匪軍中去當兵，而是到部隊農場去勞動。據毛共江蘇電台五十八年五月七日透露：匪軍「南京軍區」三年來辦有千畝以上「軍墾農場」五十三處。其中皖西城西湖「軍墾農場」種植面積竟達十五萬畝，由匪軍「六七六一部隊」負責。在這類「軍墾農場」中收容大批青年學生，毛共各地電台廣播中不斷有所透露，如湖北鍾祥縣康橋湖「八二二六部隊軍墾農場」、湖南洞庭湖「軍墾農場」、安徽「六四〇八部隊農場」、以及河南匪軍某部「五七農場」，均收容大批大中學校畢業生參加勞動鍛煉，接受匪軍的再教育。其中僅河南匪軍某部「五七農場」，竟有大陸各地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在內參加勞動。

大陸青年學生在匪軍農場，也大都當飼養員、當炊事員，以「培養勞動觀念，改造世界觀」。例如：

在匪軍某部農場學生二連中，有一個學氣象的女學生被安排喂豬，她覺得：「我學氣象是『管天』的，現在來『管豬』，有什麼意思。」結果受到批判。（註六）

在匪軍廣州部隊某部農場接受再教育的女大學生黃延，被分配到炊事班喂豬，每天起早摸黑，挑着豬食喂豬，光着腳打掃豬圈，日子一長，腳泡爛了，走起路來痛得厲害，但是她把養豬的工作完成後，還要在炊事班工作。據說：「褲子破了，她第一次拿起針線，一針大、一針小地補了起來；勞動工具壞了，她學着自己動手修理；沒有路，她挑土來鋪，碗沒處放，她和同學們出去揀小竹片回來，製作放碗架」；「在舊學校裏，黃延怕髒怕臭，見

了糞車就繞道走。現在，她看見菜地缺肥就着急，趕快挑糞去澆。她還經常抽空出去揀糞，有時跑出好幾里，看見一堆牛糞，連忙用手捧到筐裏。」（註七）這段話如果不是毛共報紙的誇大宣傳，那麼，必然是受迫不得不做，因爲毛共改造思想的功效決沒有這麼宏大、這麼迅速。

在匪軍四八〇〇部隊鹽場鍛煉的女大學生魯天玉，也當上了「豬倌」。

「爲了節約糧食，小魯一有功夫就拎着籃子爲豬找野菜。海灘上的野菜有鹹味，不少野草還有毒，魯天玉每逢拔一種野菜時，總是先嘗一嘗，有時中了毒，嘴腫得老高，她也不在乎。採回的野菜她都洗得乾乾淨淨。」「爲了把豬喂好，她跑到幾里地外爲豬挖野菜；大冷天，她還下到河裏爲豬撈水草；豬病了，她一口一口給豬喂稀飯；豬生了虱子，她一個一個給豬拿掉。」（註八）如此說來，大陸青年學生的生活不僅不如牛馬，簡直連豬狗也不如了。女生如此，男生當亦如此。

大陸青年學生在匪軍農場中充當飼養員或炊事員，還要受匪軍的控制和迫害，實在比下放農村勞動更爲悲慘，其身心的痛苦，當更加難以忍受！

（三）下放工廠做工

大陸青年學生下放工廠者較少，其在工廠裏所做的乃是「單純勞動」、「輔助勞動」、或「生產勞動」，而不是學技術、開機器，正如同下放匪軍養豬而不是當兵一樣，因此，毛共所說的學工、學農、學軍，實際上僅是口號而已，其實質都是進行勞動改造，以勞動折磨青年學生。

大陸青年下放工廠做工的情況，大約如下：

以毛共上海財經學院而言，是實行以連隊爲單位，分批輪流下廠參加生產勞動的制度。每一連的「工宣隊」隊員及其領導的全系師生（二百人左右），每個月抽出一定時間到上海自行車廠參加勞動。（註九）

以毛共天津碱廠中學言，該校原爲塘沽一中，係天津碱廠的廠辦學校，由廠「革委會」和車間兩級建立「教育革命小組」，負責下廠師生的教育和勞動問題。其具體做法是：一個學生連隊同一個車間（隊）「對口掛鉤」，如機修一隊和學校六連「對口掛鉤」，每周一個排到機修一隊學工勞動，接受再教育。全校每天有三十多個學生排，一千餘名師生在廠參加勞動，在勞動時，該廠工人以「一幫一」、「帶徒弟」等辦法對師生進行再教育，俾便

嚴密控制其勞動進度和生活言行。(註一〇)

以毛共西安市二十二中言，在學生參加絲綢二廠勞動時，尙由老工人作「憶苦思甜」報告，組織學生吃「憶苦飯」，而對於勞動的安排却極不合理，因而透過該廠向毛共提出下列的建議：

1. 關於勞動時間安排，應該考慮到中學年級的差別而有所不同。一般說，中學高年級學生全年「學工」時間以兩個月爲宜，每天勞動四至六小時。中學低年級學生則相應減少勞動時間。

2. 要針對學生年齡、性別、體質的不同，堅持「三定四不」，即定車間，定工種崗位，定師傅管理；危險的活不安排，笨重的活不安排，夜班不安排，對學生不規定生產指標。

3. 在加強安全教育的同時，學生在勞動期間，勞動保護用品應由工廠負責解決。(註一一)

毛共對於這些建議是否接受，則不得而知。從這些建議中，我們不難看出：下放學生的勞動，定時定量，既勞累，又危險。他們的思想言行有人管、生產勞動有人管，而福利和安全却沒有人去管。

前面已經提到，大陸青年學生不僅要下放農村或工廠接受勞動改造，其在校裏也要參加生產勞動，而且，不僅大學生要勞動，小學生也要勞動，例如毛共廣東省五華縣油田公社化裕大隊的小學（附設初中班），就種了「紅小兵試驗田」，這些「試驗田」，「從拔秧、運肥、插秧到積肥中耕，全是那羣十來歲的紅小兵們幹的。」(註一二)。由此可知，在毛共統治下，學生從小就要訓練成爲工奴或農奴。

三 毛共對學生的思想改造

毛澤東雖然是唯物論者，但是他對於意識形態却非常重視，因而對一般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和精神虐待，始終不遺餘力，時而洗腦，時而交心，弄得他們身心交疲，痛苦不堪。例如邵荃麟即曾公開指出：「思想意識的改造是艱巨的，甚至是痛苦的過程。知識份子從舊到新，是苦難的歷程。」(註一三)

學生是青年知識份子，因而毛澤東對學生的思想以極爲注意，認爲「學

校一切工作都是爲了轉變學生的思想」，並主張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及「工宣隊」進駐學校，其對學生思想之迫害，則更變本加厲；具體說來，其普遍的作法約爲：

1. 「一學、二查、三比、四統」——毛共駐西北大學「宣傳隊」即採此辦法展開鬥批改運動。「一學」就是舉辦各種類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二查」就是檢查總結執行政策情況；「三比」就是參觀訪問「先進單位」，然後同本單位的工作加以對比，從對比中找差距；「四統」就是對某一個具體問題或某一個人如有不同看法，「宣傳隊」就展開討論，「分清是非，統一認識」。(註一四)這種辦法的要旨，就是結合工作、控制思想。

2. 「一幫一、一對紅」活動——毛共「宣傳隊」在「中央美術學院」即曾推行「一幫一、一對紅」活動，並且要求實行「五心」，即「首先是要誠心，第二是要虛心，第三是要知心，第四是要交心，最後達到同心，結成一對忠于毛澤東的紅心。」(註一五)「一幫一、一對紅」，實際上就是人盯人、人監視人的特務手段，將那些青年學生的思想言行徹底控制起來。

毛共對青年學生的迫害，手法既毒辣，態度更爲惡劣，例如：有人認爲：「咱說什麼，青年就得聽什麼；咱咋說，青年就得咋做」；有人認爲：「對這些洋學生，非得狠狠克一下不行，下不了刀子，治不了病」、「訂幾個條條，誰違犯就叫他說出個道道來，省得這麼多人費嘴磨牙」；有人認爲：「對知識青年越嚴越好，一天到晚，專挑他們的毛病，使他們感到壓力很大。」(註一六)如此態度，如此作法，自然要引起青年學生發生反感，越壓越糟，越改造越使他們「思想空虛，行動動搖」，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四 大陸學生對毛共迫害的反應

大陸青年學生在毛共的雙重迫害下，精神肉體均已到達難以忍受的地步，因而紛紛起來抵制和反抗：

1. 抗拒「宣傳隊」——大陸工農在「紅衛兵」串連時期，曾經與青年學生不斷發生武鬥，結下仇恨，及其組成「宣傳隊」去領導和控制青年學生，彼此自然難免形成對立的狀態。去(五十八)年春季，上海大專院校曾普遍掀起抗拒「宣傳隊」的活動，例如上海交通大學學生曾迫使「宣傳隊」撤出

學校。甚至尚有「三進三出」、「四進四出」者；又如復旦大學師生對於「宣傳隊」的「管頭（思想意識）」、「管腳（階級立場）」，曾紛紛表示討厭、抱怨和反抗。其他各地各校，亦有類似的抗拒「宣傳隊」的情事發生，於是毛共乃加派匪軍進駐學校，以資鎮壓。

2. 反對思想改造——大陸青年學生，特別是大學學生，因遭毛共無情的迫害，大都感嘆上大學是「犯了戰略性的錯誤，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得不償失；下放後則產生如此想法：「放下筆桿子，省得動腦子，拿起鋤把子，不再扣帽子！」於是「上工悶頭幹，下工三不管」，僅為「搵分」（工分）、吃飯、活命而已。（註一七）據今（五十九）年一月十四日毛共上海「解放日報」透露：當前下放青年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那就是以「參加體力勞動」為藉口，迴避現實的「階級鬥爭」，反對「思想改造」。該報又指出：「知識份子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根本目的在於改造世界觀，實現思想革命化。」「有那麼一些人，在勞動中把身體練得棒棒的，肩挑一百五十斤，思想反而更反動。這種人，究竟為什麼而勞動？難道不值得無產階級提高警惕嗎？」這種傾向和事實，不僅抵制着毛共的「思想改造」和「大批判」的政策，而且否定了毛共的「革命化首先要勞動化」的教條。

3. 展開抗暴鬥爭——大陸歷年下放農村的青年學生，在「文革」初期曾乘「紅衛兵」串連之機會，湧回城市去造反，助長了大陸的動亂。這批青年學生旋即被毛共驅返農村，如今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必然又與新下放的青年學生們聯合起來，共同從事反抗暴的活動。

事實上，據中央社敵後消息，大陸青年學生業已普遍掀起反毛浪潮。該社三月二日報導說：武漢毛共最近宣佈破獲一個反毛組織，並有八人被捕，其中有一個是偽「武漢市戲劇工作者革命委員會」委員，其餘都是偽「武漢大學」學生。四日報導說：自下放地區返回上海的所謂「盲流」青年六百多軍，因不堪凍餓之苦，曾湧入閩北工人公寓，搶奪糧食衣物，與到場鎮壓共人發生衝突，雙方都有多人受傷。六日又報導說：共匪下放廣東各地知識青年，最近與各城市疏散下鄉的人口相結合，形成了新的反共組織，風起雲湧地掀起了抗暴鬥爭。

這些事實又一次證明了「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強」的道理。毛共如此迫害青年學生，預料其必將自食惡果。

- 註一 見毛共武漢紅衛兵刊物「鋼九一三簡訊」第七期。
- 註二 見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毛共香港「大公報」。
- 註三 見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毛共「人民日報」。
- 註四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共「人民日報」。
- 註五 引自「妹妹的日記」一文，見五十六年十月三十日毛共湖南革命青年三二一一部隊出版之「三二一一戰報」。
- 註六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共「人民日報」。
- 註七 見五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毛共「光明日報」。
- 註八 見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毛共「光明日報」。
- 註九 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毛共「光明日報」。
- 註一〇 見五十八年三月七日毛共「光明日報」。
- 註一一 見五十九年二月十六日毛共「人民日報」。
- 註一二 見五十八年六月八日毛共香港「大公報」。
- 註一三 見毛共「文藝報」五十三年第八、九期合刊第十八頁。
- 註一四 見五十八年三月十日毛共「人民日報」。
- 註一五 同註九。
- 註一六 見五十八年六月十三日毛共「人民日報」。
- 註一七 見五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毛共「人民日報」。

郭華倫 著

中國共產黨史論

第二冊 出版

本書凡七百餘面，廿四開本，精裝一厚冊，每冊定價新台幣二百八十元（航空另加郵費），讀者可向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組或函台北市郵箱一一八九號洽購。